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市改革的递次突破及其逻辑关联

郑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市改革递次突破,并不是各自孤军深入。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促进农村发展,为城市改革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积累了经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发展,为农村改革发展打开了深化拓展的空间。农村、城市改革递次突破,实现城乡改革发展相互促进,表明城市与农村在制度变迁上具有内在关联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以搞活为内核的改革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这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主要通过计划手段保障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由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开启打破长期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程,到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打破,促进了市场取向改革下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构建,为坚持系统观念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决策部署提供了历史经验。

关键词: 农村改革; 城市改革; 工农城乡关系; 逻辑关联

中图分类号: F299.2;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57(2025)04-0043-08

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25.04.004

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目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工农城乡关系演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以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为取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探索促进工农城乡发展协调路径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以搞活为内核的改革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这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主要通过计划手段保障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抉择,但改什么,如何改,是中国共产党要在实践中作出回答的问题。1978 年底至 1991 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稳步展开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农村、城市改革递次突破。农村、城市改革递次突破,并不是各自孤军深入。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率先突破(以下简称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促进农村发展为城市改革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积累了经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城市发展为农村改革发展打开了深化拓展的空间,形成城乡改革发展相互促进的路径。这是基于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长期实施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所形成并固化的工农城乡关系的突破。

一、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开启了打破长期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程

对于农村改革率先突破,有的研究仅限于实行包干到户的突破(在政策语言表述上,当时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改称家庭承包经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无疑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或

收稿日期: 2025-04-27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2025CCXZ0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0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2021mgczd009)

作者简介: 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者是具有标志性的制度变革。但是,仅仅将农村改革率先突破限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既没有厘清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的内在因素,也没有将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及至今的改革开放的历程贯通起来。鉴于此,下面对中国在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后,如何通过农村改革,突破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所形成并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探讨。

(一)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抉择起至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纲领性文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6年间,城乡各方面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但在成功突破上农村先于城市。判断改革突破是否农村先于城市,既要考察改革是否形成新的制度以及政策体系,也要考察形成的新制度以及政策体系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的绩效。在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上之所以能够形成共识,是因为农村改革所形成的新的农村政策体系以及具体政策措施的切实实施,搞活了经济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在成效上比城市改革发展更明显一些。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的体现:

第一,突破了服务于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战略目标的农村制度安排。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实行农村集体经济、农产品统派购、城乡二元户籍、城乡二元财政、延续两千多年的征收农业税等制度,是一种基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双重目标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其实施实现了快速推进农业发展和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预期目标。然而,这些制度长期实施的共同作用,导致城乡经济不活跃、集体经济组织自主权不充分、农业生产集体劳动难以避免平均主义分配和农民在集体劳动中“搭便车”等问题,这些既导致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偏斜运行,还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是基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搭便车”现象展开的,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销售、农村劳动力就业、乡村治理等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上,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改变单一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生产经营方式,增加了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层次,重塑起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农村这一经营主体,解决了单一的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中农民劳动投入难以精准考量而发生农民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激励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农民在集体劳动中“搭便车”问题。在计划、市场配置资源上,尽管计划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但恢复农贸市场,减少农产品征购基数和农产品统派购品种,率先放开水产品市场,农产品市场销售量逐步扩大。在就业上,突破了农民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就业政策,还可以向非农产业拓展,包括可以就近亦工亦农,可以进城经商务工,可以购置汽车从事运销业务等。在乡村治理制度上,实行政社分设和村民自治。

第二,突破了工农长期偏斜运行态势,在增速上农业高于工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以工农协调发展为取向,由于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工农偏斜运行问题长期存在。1953—1978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1.48%,农业增加值只增长2.07%,两者比值高达5.55:1。^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增加家庭承包经营这个层次、农产品市场销售量逐步扩大等搞活政策的实行,与实行农村多种经营的产业政策共同作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以充分释放,并促进生产力水平提升,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大幅提高,农产品长期短缺问题得以缓解,局部地区还出现卖粮难现象。这一时期扭转了在增长上长期存在的工业远高于农业的现象,农业快于工业,发生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不同的现象,即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降反增,由1978年的27.9%增加为1984年的31.8%,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则由1978年的44.1%下降为1984年的38.7%。^②同时,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社队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第三,在缩小城乡差别上实现突破。一方面,在收入增速上,农村居民高于城市居民。1978—198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提高到65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355.3

^①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75页。

^②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67页。

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大幅减少,由2.57:1缩小为1.84:1。^①另一方面,随着农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在生活改善上农村居民快于城镇居民。1978年至1984年农民消费水平快速提升,人均消费支出由116.1元提高到273.8元^②,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很多农民将茅草房更新为砖瓦房,自行车、手表等更多进入农民家庭;综合反映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基本未变,即由57.5%变为58.0%,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则明显改善,由67.7%降为59.3%,降了8.4个百分点。^③

(二)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的主导因素和实现路径的历史基础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的主导因素是,中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生产力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中国共产党坚持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差别的目标,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后,调整形成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的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新路径,即以实行搞活政策解决长期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下工农偏斜运行积累城乡差别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在城市和工矿区发展工业。尽管1949—1978年中国农业综合生产力实现大幅度提升,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0万吨大幅增至1978年的30476.5万吨,但工业城市发展比农业农村发展更快,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于工业城市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这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就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一文件根据一年试行情况进行修改,由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明确了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25项政策和措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从1982年起连续5年出台和实施了以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分析,这一系列政策能够出台和切实实施的主导性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工业自我积累能力增强。这一生产力的历史性跃升与国际形势变化后可以引进国外资本共同作用,缓解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的压力,进而为突破以保障农业向国家工业化提供较多资金支持为目标之一的农村制度安排提供了条件。

此外,从实现路径的历史关联性分析,农村改革率先突破还有以下原因:

首先,非计划经济的历史基础。中国尽管发展计划经济,但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有所不同,长期存在一些非计划经济因素,这在农村较为明显。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非计划经济因素:一是中国农业生产实行计划管理,最终落实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完成国家的农产品统派购指标,这也在生产上给了基层一些选择空间。二是农户还有自留地,以及发展养猪牛羊、鸡鸭鹅等副业,其产品可到集市销售,这几乎涉及每个农户。三是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其原材料和市场都没有纳入国家计划,而是靠农民踏遍千山万水、吃遍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简称四千四万精神)谋求发展。这些非计划经济因素为在农村实施搞活政策提供可选方案和奠定了实践基础。

其次,包产到户的历史基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一些地方的农民为解决成员与成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在贯彻中央关于建立生产责任制精神的过程中,创造了包产到户等责任制,这一经营方式虽在改革开放前三起三落,但深深烙在农民心里,引发了家庭承包经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兴起和快速推广到全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除了有包产到户三起三落的历史基础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这是家庭承包经营能够成功在全国推广的生产力因素,也是必要的因素。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起,中共中央就开始探索建立“包”字头的多种形式责任制,但因组织化可以降低农业剩余向工业转移和农产品统派购的成本,从实现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的目标出发,需要坚持集体统一经营,加之视包产到户为单干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在中央倡导包工

①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81页。

②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81页。

③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81页。

到组等“包”字头责任制基础上创造的包产到户三次兴起都被取缔了。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农业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提供资金支持的压力缓解,加之解放思想,这是改革开放前实行包产到户不具备的条件。改革开放初期,自下而上实行的包干到户、包产到户改革尽管阻力重重,但已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解放思想,成为突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受到的意识形态障碍,进而在全国推广的充分条件。

最后,农民的创新精神。这是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发挥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主体作用。农民在中央以搞活为取向推进改革的激励下,基于三起三落的包产到户和非计划因素等历史基础,创造了家庭承包经营、村民自治等制度。中央善于总结推广农民的实践创造,在制度变迁上实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突破了为保障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目标的实现而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开启了打破长期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程,共同成就了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和农业农村的快速发展。

(三) 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促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①这一表述表明,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对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积极意义,这在当时就达成了共识。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对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农村改革促进农产品产量的快速增加,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还为城市提供了数量更多、品种丰富的农产品,城市居民生活由此得以改善,为改革凝聚力的增强奠定了物质基础。农业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国家财政状况逐步好转贡献了力量,为国家“六五”计划主要指标的提前完成做出了贡献。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后,在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吃穿住行用方面的工业品消费大幅度增长,增强了对城市工业发展的拉动能力。

其二,增强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以搞活经济为取向的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为此,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②改革促进农村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并形成以生产力是否发展判断改革是非的标准,这对于开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是最重大的意义。

其三,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示范效应和积累了经验。农村改革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上引发的示范效应,最有意义的是中央总结推广农民创造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变革所提供的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集体和家庭双层经营,完善承包经营分配制度以保障国家、集体、农户利益共同改善(实现帕累托改进),并赋予承包经营的农户自主经营权。随着农村改革成效的显现,承包制、村民自治、股份合作制等制度被城市借鉴,在国营企业推广承包责任制、对城市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在城市实行居民自治等。

由上可见,将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纳入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的长时段考察,可以更真实呈现改革进程,厘清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不仅仅是制度突破,更不是单一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突破,而是开启了打破长期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上升到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水平,其实质是基于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水平对工农城乡关系的重构。如果不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进而实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产业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5页。

构转型这一历史性演进进行深入分析,就会陷入基于现象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形而上学思维。

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打破

关于改革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说,是相对于之前改革以农村为重点而言的,或者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表述。以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标志,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促进了经济的全面活跃,打开了深化拓展农村改革发展的空间,促使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打破,推动了市场取向改革下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构建。

(一)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包括城市在内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许多探索,一些重大措施的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如此,城市企业经济效益仍较低,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生产、建设、流通领域的损失和浪费较为严重。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标志性事件是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鉴于20世纪80年代初国有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绝对主体地位,而且集中在城市和工矿区,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必然要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进行设计和推进。换言之,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减少农产品征购基数、恢复农贸市场、放开水产品市场等单项改革突破有所不同,需要对整个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次全会在农村改革率先突破积累改革经验、奠定物质基础、增强改革信心的基础上,通过了《决定》。

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第一个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的纲领性文献。全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明确推进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基本方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逐步建立起保障国家工业化战略实施的全国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面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中央曾多次下放权力,但都没有跳出原有的体制框架,仅限于对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管理权限的调整,对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没有实质性推进。《决定》基于改革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发展,提出“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①,将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明确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②。“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③

(二)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全面活跃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与之前的农村改革相比,在实行经济民主的市场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与之前中国共产党总结农民创造经验推动农村改革的做法有明显不同,就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创新推进改革。《决定》形成了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就是提出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并明确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实际上是对实行搞活政策实践的一种理论升华。基于搞活政策的实践及理论升华,从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出发,《决定》明确了基本方针政策,包括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4—345页。

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基于系统观念提出了改革的问题导向,明确指出“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强调,围绕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这一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主要应该解决好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即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①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以搞活为取向的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全面搞活,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改善。

第一,促进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1985—1988年,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年均增长11.30%,比1979—1984年的年均9.21%高2.09个百分点。尽管1989—199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治理整顿,1985—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仍实现8.90%的高速增长。^②

第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演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由1984年的2295.6亿元、3124.7亿元和1858.2亿元,分别增加到1991年的52888.8亿元、9129.8亿元和7587.2亿元^③,第二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增长更快,使得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1984年的31.5%下降为1991年的24%,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由1984年的42.9%和25.5%变为1991年的41.5%和34.5%。^④第三产业的快速提升,表明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活跃度提升。

第三,提高了经济效率和人均经济水平。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5元提高到1984年的702元,再提高到1988年的1378元和1991年的1912元。^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1979—1984年为7.74%,1985—1988年为9.63%,1985—1991年为7.29%。^⑥

第四,促进了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1984年的23.0%,再提高到1988年的25.8%和1991年的26.9%,即在1979—1984年平均每年提高0.8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1985—1988年平均每年提高0.7个百分点,1985—1991年平均每年提高0.56个百分点。^⑦城镇就业人员在城乡就业人员的占比,由1978年的23.69%提高到1984年的25.37%,提高到1988年的26.26%和1991年的26.67%^⑧,在破解改革开放前长期存在的城乡就业结构转换严重滞后于一二三产业结构转换问题上持续取得进展。

(三)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市场取向改革下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构建

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改革发展打开了深化拓展的空间,进一步推动了市场取向改革下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构建。

一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村改革,为市场取向改革下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提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6页。

②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73—374页。

③ 本书编写组《新中国75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2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4年,第361—362页。

④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65—366页。

⑤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62—363页。

⑥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73—374页。

⑦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54—355页。

⑧ 《辉煌70年》编写组《辉煌70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1949—201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357—358页。

供了制度基础。一方面,在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改革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农村率先在市场取向改革实现突破,但由于阻碍农产品流通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产品质量不高、品种不全,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优势不能发挥。其中,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曾经保证供给、支持工业发展作用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弊端日益显现,影响着农村商品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家庭承包经营打破单一集体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中分配上的“大锅饭”之后,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农村产业结构改善,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基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创新,中国推进旨在疏通城乡流通渠道的改革。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针对在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存在的问题,作出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部署,决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①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农村改革发展的方向与基本政策的同时,对把改革引向深入和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作出进一步部署。

二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给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促进城乡“两条腿”工业化路径的形成,农村产业结构实现历史性变迁。随着市场调节范围的扩大,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在按照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向深化改革,以及国营企业与乡镇企业的横向联合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横向联合获得广泛支持,提高了在国家计划外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在所需要资源的可获得性,扩大其市场拓展的空间;在国营企业技术人员更广泛地以“星期天工程师”的方式参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同时,国家实施重大项目“星火”计划向乡镇企业推广先进技术,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促进了乡镇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区域布局上,鼓励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相结合,开始改变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发展方式。这些都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1984—1988年是自有社队企业起至此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增长比1979—1983年更快。在1989年起3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的宏观经济政策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1989—1991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4%^②,仍为高速增长。1986年,中国乡镇企业非农产业产值达3472亿元,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是农业总产值3010.7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115.3%。这表明乡镇企业产值在农村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这是农村产业结构实现的历史性变迁。

三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打开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空间,在就业上进一步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随着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速。乡镇企业职工数由1984年的3848万人,快速增加到1988年的9545万人,在3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政策下到1991年也略增至9609万人。

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和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随着国营企业改革的推进,国营贸易和加工企业开始探索与农户签订产销协议,以订单的形式确定产销关系,形成农业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一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尽管公司与农户在交易谈判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难问题的解决,国营贸易和农产品加工企业都与农户都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市改革递次突破,实现城乡改革发展相互促进,表明城市与农村在制度变迁上具有内在关联性。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率先突破促进农村发展,为城市改革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积累了经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及其促进城市发展,为农村改革发展打开了深化拓展的空间。这一由农村改革率先突破开启打破长期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程,到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的打破,促进了市场取向改革下工农城乡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构建。将改革开放初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贯通考察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上以协调发展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27页。

^② 何康主编《中国的乡镇企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为取向不变,只是基于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探索工农城乡相互促进的实现路径。深化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研究,构建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学术体系,需要基于系统观念对工农城乡关系演进进行实证分析,厘清工农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城乡改革发展不能各自孤军深入,需要基于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实现城乡改革发展相互促进,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城乡改革内在逻辑关联对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启示。

(责任编辑:张慧娟 责任校对:张慧娟)

The Logic of the Sequence of Breakthroughs in Rural and Urban Reform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ENG You-g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equence of breakthroughs in rural and urban reform was not a separate and isolated deepening, but a systematic approach based on systematic thinking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ural reform came first, which promoted rural development, laid a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accumulated experience for urba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urban-centered overal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promoted urban development and opened up space for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sequence of breakthroughs in rural and urban reform, which realize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mo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reform by means of revitaliz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in which it focused on achieving the goal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mainly ensur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planning means. The journey of breaking the long-term solidified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with the breakthrough of rural reform, and the further breaking of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by the urban-centered overall economic system reform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under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provided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adhering to the systematic concept and implementing the decision-making and deploymen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Perfecting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rural reform; urban reform;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logical correlation